

农村青少年辍学打工及其原因^{*}

刘成斌

【内容摘要】文章以农村青少年的长远发展为导向,探讨农村青少年辍学打工现象的存在状况及其原因。教育统计年鉴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均表明:农村青少年辍学外出打工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同时,抽样调查数据表明农村青少年辍学打工与以下因素存在因果关联:农村社会距离、城市社会距离、个人经济观念强度及其对宏观社会形势的认知取向、父母教育观念和方式等方面。这表明除城乡差距等结构性的原因外,农村青少年的个人思维特征成为突出问题:其辍学外出打工的选择表现出过于经济理性、片面性和短期性的决策思维模式,缺乏长远的发展规划。但辍学打工不应该被看作是农村青少年的个人选择问题,而应当看作社会问题,必需通过政策调节来改变。所以,基于矫正过于功利、单一的经济导向出发,应当实施梯度人口流动政策。

【关键词】农民工;辍学打工;经济理性;流动政策

【作者简介】刘成斌,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74

Dropping Out of School for Work for Rural Youth and Its Determinants

Liu Chengbin

Abstract: In addressing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rural youth,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henomenon and the mechanisms of school dropout for migrant work for rural youth which is currently a common social problem in China. The analysis based on survey data shows that dropout for migrant work is related to the following factors: the distance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society, individuals' economic attitude, their perspective on macro-social trends, and their parents' educational concept and method. Other than the structural issue on the urban-rural differences, the decision of rural youth of school dropout for migrant work is made by an economic-rationality-based model. However, dropout for migrant work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solely as a personal issue of rural youth, but also a social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through policy adjustment.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a gradient based migration policy be adopted to avoid a single, utilitarian and economically orientated perspective.

Keywords: Peasant Workers, Dropping out of School for Work, Economic Rationality, Migration Policy

Author: Liu Chengbi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ail: shlpinshehui@163.com

^{*} 本研究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农村建设与农民工回流的社会学分析”(10CSH015)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专项基金(2014WQY012)资助。

1 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农民外出打工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不外出打工而在家务农的青壮年劳动力往往被周围的熟人看成是传统、守旧、“没出息”。虽然部分时间段出现过因经济危机等而导致部分农民工被迫回流,部分农民工也选择返乡创业,但总体上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仍然是主流。主要劳动力大多外出甚至是过多外出带来的农村空心化等问题显现出不少社会问题,如数年来留守儿童意外死亡事件频见报导,农村初中生为外出打工而辍学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在部分地区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

中国语境下的农民外出打工是指本来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口转移到工业或商业等非农业生产领域,是一种流动现象(floating)而非正式的人口迁移(immigration),这种流动是因为产业之间的劳动力转移而形成的。按照法律政策来讲,农民作为产业劳动力进行转移的年龄条件应该达到18岁至少达到16周岁才能外出,如果16周岁之前外出是属于违反法律规定的打工行为,劳动力使用单位有使用童工的嫌疑。按照义务教育推算,7岁上学,小学6年,初中3年,应该是16岁以后才可能外出,否则就是辍学打工。所以,辍学打工不但违背了义务教育的要求,也违背了劳动务工年龄的法律规定。

从现有的官方公布数据和学术调查来看,农村青少年辍学情况总体上水平偏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8年初中辍学人数达140万(国家统计局,2010,转引自牛建林,2012);农业部2003年调查样本中农民子女的辍学率平均为10.7%(卢德生、赖长春,2009),王身佩等人运用官方统计数据对河南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发现,2000、2002和2003年三届初中三年级学生的辍学率分别是20.44%、12.88%和8.95%(王身佩、徐宏升、王连照,2006)。

现有研究中对辍学“微观”因素的分析主要关注家庭关系、父母管教方式、老师教育方法及学校管理方式等。如牛建林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与县级主要社会经济统计资料的分析发现,农村地区同龄人外出务工对初中生辍学具有吸引与示范作用,具体表现为一个区县同龄人外出务工的比例越高,在校学生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的可能性越高;与完成义务教育者相比,初中辍学者更有可能外出务工,但家人外出却可以降低农村中小學生辍学的可能,促进其接受较高的教育(牛建林,2012)。苏群等人通过实证调查数据分析认为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户主职业、子女个数、家中是否有病人以及子女个人特征诸变量对农户子女辍学行为有显著影响,外出打工的父母及家庭生活方式的变化会影响孩子的学习生涯(苏群、丁毅,2007;卢德生、赖长春,2009;瑞雪·墨菲,2009)。

现有研究中关于辍学的“宏观”因素分析主要强调国家政策、社会风气与文化环境。如有学者认为大规模持续的农民流动带来了村庄生活方式、社会组织以及家庭结构的深刻变迁,由此对农村学校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农村青少年面对的大环境日益恶化,加上社会功利观的盛行,共同导致大量的农村青少年转向打工挣钱而非继续学业(黄平,1998;蒋中一、戴洪生,2005;谭深,2011)。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民工荒”等强调经济增长的话语背景下,本研究以农村青少年的长远发展为导向,拟探讨农村青少年辍学打工现象的存在状况及其原因。具体预描述辍学者所占比例、规模推算,在此基础上运用回归分析呈现首次打工时辍学外出的影响因素,并基于此提出可能的政策方向。

2 研究样本与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统计年鉴的数据,统计年鉴数据的选择主要是基于区域分布的东、中、西部,还考虑到农民工的流出地与流入地,分别选择广东、浙江、湖北、河南、贵州、四川六个省。二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调查数据(2010年7月至2011年2月进行),样本抽取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式进行,分东、中、西部抽取六个省,由于调查执行条件原因,将前述六省中的广东换成了福建。每省按照区县名单进行简单随机抽样,在抽中的区县招募户籍来源地对应的在校大学生(即这个学生来自该区县),而且要求上大学前在农村生活,以便能更顺利地返回村庄进行调查。招募到学生的村庄即为样本村。本研究共有样本村66个,计划调查农民工样本为1050份,由招募的调查

员按照类型抽样的方法入户调查,实际回收的调查问卷 860 份,有效问卷 817 份。同时,执行村干部调查问卷 65 份。样本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Table 1 Sample Characteristics

| 项目 | | 频数 | 频率 | 项目 | | 频数 | 频率 | |
|------|---------|-----|--------|-------------------|-------------|-----------|------|------|
| 性别 | 男 | 474 | 58.0 | 第一次 外出打 工年龄 | 15 或 15 岁以前 | 44 | 5.4 | |
| | 女 | 343 | 42.0 | | 16 岁 | 30 | 3.7 | |
| 年龄 | 35 岁及以上 | 506 | 61.9 | | 17 岁 | 45 | 5.5 | |
| | 35 岁以下 | 311 | 38.1 | | 18 岁 | 44 | 5.4 | |
| 文化程度 | 小学及以下 | 192 | 23.5 | | 19 岁及以后 | 414 | 50.7 | |
| | 初中 | 379 | 46.4 | | 缺省(未打工) | 240 | 29.4 | |
| | 中专技校 | 75 | 9.2 | | 婚姻 状况 | 未婚且没有女朋友 | 70 | 8.6 |
| | 高职 | 5 | 0.6 | | | 未婚但已经有女朋友 | 36 | 4.4 |
| | 普通高中 | 93 | 11.4 | | | 已婚 | 674 | 82.5 |
| | 大专及以上 | 63 | 7.7 | | | 离婚 | 9 | 1.1 |
| | 缺省(未填写) | 9 | 1.1 | 丧偶 | | 21 | 2.6 | |
| | | | 缺省(未填) | 7 | | 0.9 | | |
| | | | | | | | | |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方法主要采用描述统计与回归统计。描述统计主要是辍学率的推断、农民工辍学打工的原因认知、首次外出时岗位获得途径等;回归分析主要是基于农民工辍学打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回归分析的因变量:在调查问卷中设计的是定距变量,即首次外出打工时年龄,采用填空题;基于本研究主题为“辍学打工”,分析回归方程时把调查对象首次打工的年龄转变为是否辍学外出:外出年龄为 15 岁及以前的设置为 1,代表“是”;年龄为 16 岁及以后设置为 0,代表“否”。回归分析的自变量包括性别、年龄、个人经济观念强度、父母教育观念和方式、首次外出前的家庭经济在村庄中的层次评价、家庭人均土地面积、村庄打工普遍程度、农村社会距离感、城市社会距离感、宏观社会发展的认知等。

主要自变量的操作定义如下:性别采用虚拟变量赋值,男性为 1,女性为 0;打工前的家庭经济地位判断采用“上、中上、中、中下、下”五等级判断。关于农民工及其父母的社会认知、社会观念方面的变量均采用李克特量表测量,每一项依照同意或符合程度赋值,采用 5 分制。每个观念或认知方面的自变量包含 10 项“问题”,最终每个自变量的赋值区间为 5~50 分。

“个人经济观念强度”的十个问题包括“能够挣钱就是好事”、“理想再好不能挣到钱就没有用”、“农村人为了打工而辍学是正常的”、“打工能挣到钱一样活得精彩”、“有钱能使鬼推磨是正确的”、“挣钱比一家人在一起还要重要”、“农村人有钱一样有地位”、“学费太贵上大学不划算”、“没钱的人都会比较自卑”、“农村劳动方式自由不太挣钱我就不喜欢”。

“父母教育观念和方式”是采用调查对象感知到的父母在下列问题上的态度倾向而得到的“农民即使对子女教育很重视,孩子也不一定考上大学”、“农村人即使考上大学也难找好工作”、“农村孩子即使上大学找到工作也不一定比打工挣钱多”、“农村孩子学习不如城市的孩子好”、“农村孩子比城市孩子笨”、“农村父母没有城市父母重视子女教育”、“农村孩子生活习惯不如城市孩子”、“农民即使有条件孩子成功的机会仍然小于城市”、“早点打工挣钱会更多”、“在父母的影响方面农村孩子不如

城市孩子”。

“宏观社会发展趋势”的认知包括“您身边熟悉的人中,大多数人的生活压力增加”、“身边的大多数人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下降”、“抱有怨恨心理的人数增加”、“社会贫富分化加快”、“底层人向上流动没信心”、“农村孩子对教育没信心”、“民众不满情绪”、“官员腐败程度”、“总体社会稳定”、“群体上访事件发生增多”。

“农村社会距离”测量包括“我喜欢家乡农村的安静环境”、“我喜欢家乡人与人之间的亲近”、“我喜欢家乡熟悉的生活环境”、“农村劳动方式很自由”、“农村消费低”、“我不习惯家乡比较单调生活方式”、“我对靠农业生活完全不抱信心”、“我对农业劳作技术基本不了解”、“我非常不愿意回到农村生活”、“我不希望子女在农村接受教育”。后 5 项反向计分,总分越低表示距离越近。

“城市社会距离”测量(下列因素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大小,认为影响越小距离越近)包括“城市生活费用高”、“没有医疗保障”、“买不起住房”、“小孩上学困难”、“人际交往少”、“空闲时间少”、“家人没人照顾”、“交通拥挤”、“没有家的感觉或漂泊感”、“传染病等公共卫生隐患多”,总分越低表示距离越近。

3 数据分析

3.1 “辍学”打工的调查与推断

在 817 名调查对象中,有 240 名是没有外出打工经历的人口,有 577 名是外出打工者或者是曾经外出打工现在回流到家乡。在 577 名有务工经历的调查对象中,在 15 岁及 15 岁之前就外出打工的有 44 人,占 7.6%。16 岁这一年外出打工的有 30 人,占 5.2%,16 岁及 16 岁之前打工的有 74 人,占 12.8%。但如果把调查对象按照年龄划分为 35 岁以上者的中年组和 35 岁以下者青年组,则青年组农民工首次外出打工的年龄属于 15 岁或 15 岁以前的比例为 13.3%,而中年组在 15 岁或 15 岁之前外出打工的比例只有 3.4%;青年组在 16 至 18 岁外出打工的比例为 35.7%,中年组在 16 至 18 岁外出打工的比例则为 9.1%。由此,本研究重点分析和探讨 35 岁以下人群的辍学打工问题。

在对 65 个村的村干部调查中,没有一个村庄是“无人辍学”的。所调查样本村辍学人数为个位数(9 人及以下)的有 28 个村庄,占调查村庄数的 43.1%;本村辍学人数为 10~19 人的有 16 个村庄,占 24.6%;本村辍学人数为 20~29 人的有 8 个村庄,占 12.3%;本村辍学人数为 30 人以上的有 13 个村庄,占 20.0%。由此进一步表明农村辍学的普遍性。

在上述问卷结果统计的基础上,笔者选择了三个省的三所初中(三所初中首先考虑的是学校的可介入性,其次考虑的是学校规模)进行辍学率的计算与推断。根据初中每一届学生在招生时人数及三年后毕业人数之差,扣除相应的转学(转出与转入)人数,可以得出辍学率,具体如表 2。

表 2 浙鄂豫三所初中学校的辍学率(排除转入与转出人数后)
Table 2 Dropout Rates of Three Junior High Schools in Zhejiang, Hubei and Henan %

| | 2001 级 | 2002 级 | 2003 级 | 2004 级 | 2005 级 | 2006 级 | 2007 级 | 2008 级 |
|---------|--------|--------|--------|--------|--------|--------|--------|--------|
| 浙江 D 初中 | 8.9 | 8.7 | 8.1 | 7.3 | 6.0 | 6.6 | 6.7 | 5.7 |
| 湖北 T 初中 | 4.4 | 5.0 | 10.0 | 9.5 | 12.6 | 10.9 | 7.6 | 6.3 |
| 河南 W 初中 | 9.6 | 9.9 | 6.2 | 7.8 | 9.0 | 8.3 | 4.9 | 5.4 |

注:数据来自 2010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CSH015)的调查,下面没有注明出处的数据均来自这一调查。

三个样本学校均为乡镇政府所在地的初中。浙江 D 中学在 2001 年招生规模每年在 638 人,2008 年当年招生新生只有 492 人;湖北 T 中学 2001 年招生规模为 801 人,2008 年一年级招生人数只有 620 人;河南 W 中学 2001 年招生人数为 1224 人,2008 年下降到 840 人。总体上学生规模在下降,此下降既与人口年龄结构有关,也与辍学率有关。总体数据表明三个样本学校的辍学率相对稳定在 5%~10% 之间。

如果运用同样的方法推算全国的辍学率,则得到的辍学率比笔者调查的三个样本初中更高:虽然这一计算方法忽略了转入与转出的人数,但包括广东、浙江发达区域的辍学率仍然达到5%以上)。表3详细列出了根据统计年鉴数据进行推荐的数据及推算过程,表4省略了数据列表及推算过程,直接给出辍学率。

表3 贵州的辍学情况统计推论
Table 3 Estimation of School Dropout in Guizhou Province

| 年份 | 初中学校数 | 初中毕业人数 | 初中招生人数 | 初一到初三的 减少人数 | 初一到初三 毛辍学率(%) |
|------|-------|--------|--------|----------------|------------------|
| 1997 | 1511 | 276443 | 412114 | | |
| 1998 | 1567 | 298548 | 445196 | | |
| 1999 | 1592 | 312633 | 494406 | | |
| 2000 | 1648 | 331329 | 557466 | 80785 | 19.60 |
| 2001 | 1523 | 362647 | 638216 | 82549 | 18.54 |
| 2002 | 1923 | 434933 | 703105 | 59473 | 12.03 |
| 2003 | 2068 | 502251 | 728959 | 55215 | 9.90 |
| 2004 | 2183 | 573295 | 721590 | 64921 | 10.17 |
| 2005 | 2193 | 627254 | 710857 | 75851 | 10.79 |
| 2006 | 2151 | 650318 | 704579 | 78641 | 10.79 |
| 2007 | 2189 | 645490 | 709794 | 76100 | 10.55 |

资料来源:贵州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编《贵州统计年鉴》1998年至2008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4 川鄂豫浙粤辍学率统计

Table 4 Dropout Rates in the Provinces of Sichuan, Hubei, Henan, Zhejiang, and Guangdong

| 年份 | 四川 | 湖北 | 河南 | 浙江 | 广东 |
|------|------|------|------|-----|------|
| 1997 | 15.6 | 17.3 | 6.9 | 7.4 | 10.8 |
| 1998 | 16.0 | 18.8 | 8.4 | 6.3 | 13.4 |
| 1999 | 14.8 | 16.8 | 9.4 | 5.1 | 11.2 |
| 2000 | 15.7 | 14.8 | 12.2 | 4.6 | 10.0 |
| 2001 | 13.8 | 11.4 | 5.1 | 3.1 | 7.9 |
| 2002 | 12.9 | 11.0 | 2.3 | 2.3 | 6.8 |
| 2003 | 13.6 | 8.8 | 5.8 | 2.2 | 7.9 |
| 2004 | 7.6 | 8.1 | 3.6 | 2.0 | 9.6 |

资料来源:四川省统计局编《四川统计年鉴》、湖北省统计局编《湖北统计年鉴》、河南省统计局编《河南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局编《浙江统计年鉴》、广东省统计局编《广东统计年鉴》,年份自1998年至2008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根据浙江、广东、湖北、河南、贵州、四川的数据推算,六个省份平均辍学率为10.1%;这与农业部2003年调查所得全国农村平均辍学率为10.7%非常接近(卢德生、赖长春,2009),这表明农村初中的辍学率应该普遍处于10%左右的水平。据此对全国推行估算:2000年中国农村14~35岁的青年人口总计为30127.95万人,2009年对应的是20440.12万人,那么中国14~35岁的青年人口中辍学的总规模大致在2000万~3000万之间。

3.2 辍学打工的认知

笔者经多年来的农村调查和观察发现,农村实行义务教育后,一方面是教育制度改革,不再让农民孩子交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学费,另一方面是农村经济条件好转,由此带来的总体情况是农村孩子由于经济原因辍学的比例越来越小。辍学外出打工的农村青少年大多不是由于学费、生活费用等经济

原因“被迫”辍学,而是普遍“主动”辍学。具体到辍学的原因解释,大多归咎于“成绩不好”、“不想上学了”,这是初中老师及家长最常用的农村青少年“辍学”解释。而本研究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村青少年辍学打工人群的“金钱”观念比非辍学人群更强烈:表5显示按照首次外出打工年龄分组的不同人群在选择“非常同意”功利取向的比例上存在显著差异。

表5 调查对象中35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对挣钱说法选择“非常同意”项的百分比

Table 5 Percentage in Answering “Strongly Agree” to the Question Regarding Earning Money by Yong Peasants Aged Less than 35

| 选项 | 15岁或更早(N=33) | 16~18岁(N=89) | 19岁及以后(N=127) |
|---------------|--------------|--------------|---------------|
| 能挣钱就是好事 | 27.3 | 16.7 | 14.3 |
| 理想再好不能挣到钱也没用 | 18.2 | 23.3 | 11.8 |
| 农村人辍学打工是正常的 | 54.5 | 20.0 | 11.5 |
| 打工能挣到钱一样活得精彩 | 72.7 | 26.7 | 12.2 |
| 有钱能使鬼推磨是正确的 | 54.5 | 20.0 | 11.5 |
| 人有钱比有学历还重要 | 27.3 | 23.3 | 11.8 |
| 农村人有钱一样有地位 | 18.2 | 20.0 | 11.5 |
| 大学生学费太贵上大学不划算 | 54.5 | 20.0 | 22.4 |
| 没钱的人都会比较自卑 | 54.5 | 23.3 | 12.9 |
| 对个人学历越来越没有钱重要 | 54.5 | 20.0 | 22.4 |

在农民工回答自己外出打工的动机时,15岁及更早外出打工的农民工选择“见世面、增长见识”这一项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两组;选择“别人都出去打工了”项的比例也高于另外两组,这表明农村外出打工现象对在校学生的辍学具有吸引与示范功能(牛健林,2012),但辍学打工这一组人群在“为了谋生”的选项上则明显低于另外两组。这表明辍学打工者首次打工时更多的考虑是见识外面的世界、跟随或者模仿别人的打工行为,而非生活所迫。具体如表6所示。

表6 农民工对自己首次打工原因的回应

Table 6 Reasons for Migrant Work for Yong Peasants

| 年龄组 | | 别人都出去打工了 | 给子女创造更好条件 | 见世面、增长见识 | 学技术本领 | 在家闲得慌 | 工作主要是为了谋生 |
|---------------|----|----------|-----------|----------|-------|-------|-----------|
| 15岁或更早(N=33) | 频数 | 9 | 0 | 15 | 4 | 3 | 2 |
| | 频率 | 27.3 | 0.0 | 45.5 | 12.1 | 9.1 | 6.1 |
| 16~18岁(N=89) | 频数 | 16 | 9 | 30 | 13 | 6 | 15 |
| | 频率 | 18.0 | 10.1 | 33.7 | 14.6 | 6.7 | 16.9 |
| 19岁及以后(N=127) | 频数 | 21 | 29 | 39 | 18 | 4 | 16 |
| | 频率 | 16.5 | 22.8 | 30.7 | 14.2 | 3.1 | 12.6 |
| 合计(N=249) | 频数 | 46 | 38 | 84 | 35 | 13 | 33 |
| | 频率 | 18.5 | 15.3 | 33.7 | 14.1 | 5.2 | 13.3 |

$\chi^2 = 19.390$ $df = 10$ $sig < 0.05$

大多数辍学外出的打工者对自己的选择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相反却认为是早日独立、成人的表现。但其首次外出时由于年龄不够大,也不熟悉城市的环境,缺乏找工作的经验。所以,辍学外出打工的农村青年更倾向于通过亲戚邻居的介绍而获得打工的岗位,具体数据如表7所示,这表征

着“熟人社会”或“熟人网络”对辍学打工有竟或无意的“推动”或者是“拉动”这些“推拉力量”共同形成了农村青少年辍学打工的外在环境(Harri, 1995)。

表7 调查对象中35岁以下者首次外出打工的岗位获得途径

Table 7 Ways of Getting Work for the Young Peasants

| 年龄组 | | 亲戚邻居 介绍 | 同学朋友 帮助 | 政府组织 | 单位招工 | 自己找的 | 其他 |
|------------------|----|---------------------------------------|------------|------|------|------|-----|
| 15岁或更早 (N=33) | 频数 | 16 | 5 | 0 | 3 | 7 | 1 |
| | 频率 | 50.0 | 15.6 | .0 | 9.4 | 21.9 | 3.1 |
| 16-18岁 (N=89) | 频数 | 35 | 24 | 0 | 10 | 17 | 3 |
| | 频率 | 39.3 | 27.0 | .0 | 11.2 | 19.1 | 3.4 |
| 19岁以后 (N=127) | 频数 | 34 | 13 | 5 | 29 | 44 | 2 |
| | 频率 | 26.8 | 10.2 | 3.9 | 22.8 | 34.6 | 1.6 |
| 合计 (N=248) | 频数 | 85 | 42 | 5 | 42 | 68 | 6 |
| | 频率 | 34.3 | 16.9 | 2.0 | 16.9 | 27.4 | 2.4 |
| | | $\chi^2 = 29.700$ df = 10 sig < 0.001 | | | | | |

3.3 辍学打工的影响因素

采用逻辑回归的方法,在年龄为35岁及以下的青年农民工样本当中分析其辍学外出打工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农民工首次打工是否辍学外出的逻辑回归

Table 8 Logistic Regression for Dropping Out of School for Migrant Work

| 变量 | B | S. E. | Wald | Sig. | Exp (B) |
|----------------------------|---------|-------|--------|-------|---------|
| 农村社会距离 | 0.655 | 0.222 | 8.739 | 0.003 | 1.925 |
| 宏观社会认知 | 0.289 | 0.155 | 3.492 | 0.062 | 1.335 |
| 个人经济观念强度 | 0.254 | 0.124 | 4.188 | 0.041 | 1.290 |
| 父母教育观念和方式 | 0.140 | 0.083 | 2.853 | 0.091 | 1.150 |
| 城市社会距离 | -0.475 | 0.145 | 10.800 | 0.001 | 0.622 |
| 常量 | -26.223 | 8.854 | 8.773 | 0.003 | 0.000 |
| -2 对数似然值 = 115.843 N = 158 | | | | | |

根据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方程:

$$Y = -26.223 + 0.655X_1 + 0.289X_2 + 0.254X_3 + 0.140X_4 - 0.475X_5$$

其中, Y 为首次打工是辍学外出的发生比的对数值, X_1 为农村社会距离, X_2 为宏观社会趋势的认知与判断, X_3 为个人经济观念强度, X_4 为父母教育观念和方式, X_5 为城市社会距离。根据标准回归系数公式 $\beta = B \times S. D. / 1.8138$, 可以得出如下标准回归方程:

$$Y = 1.562X_1 + 0.842X_2 + 1.210X_3 + 0.649X_4 - 1.439X_5$$

回归结果表明,性别、家庭人均土地面积、首次外出前的家庭经济在村庄中的层次评价等变量均对农民工个人是否辍学外出没有显著影响。

对农民工辍学外出打工的影响变量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农村社会距离、城市社会距离组成的“推力—拉力”因素;二是个人对宏观社会形势的认知和经济观念强度;三是父母教育观念和方式。从

标准方程来看,第一个方面的影响力最为显著,即城乡距离形成的推拉因素影响最强,其次是个人经济观念影响较大。

4 理论思考

农村青少年辍学打工的影响首先是中断学业,个人发展和未来就业空间受到较大限制。大多数辍学打工的青年缺乏一技之长,其辍学外出属于牺牲个人长远发展而“抄近路”挣钱的短期行为。抛开上大学等上升流动的机会成本不谈,在子承父业的“农二代”群体内,不同外出年龄分组的“农二代”显示出不同发展空间:15岁之前外出打工的农二代具有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比例为18.2%;而在16~18岁、19岁以后外出打工的农二代者当中具有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比例分别是39.3%、41.7%。

在辍学打工的解释上,已有研究主要归因于两种:一种是经济说和家庭因素的解释——家庭经济贫困而导致辍学,或者家庭教育观念、教育方式等非经济因素(张士菊,2003;苏群、丁毅,2007),这是将微观因素视为主导的分析思路;第二种是社会归因,有学者分析了国家人口流动政策导致农民工子女不得不留守、农民在教育投入水平与收益期望水平之间的差距较大等(王志中、胡萍,2010)。

本研究结果表明乡村距离与城市距离形成的推拉合力、个人经济观念均是显著的“自致”因素,同时父辈的教育观念也与青少年辍学有关,青少年及其父母如果抱有过强的金钱观念,就会认定“读书无用论”,进而主张孩子辍学打工。乡村距离与城市距离其实是农村青少年对城乡差距的心理折射,但城乡二元结构与差距问题、农民教育观念问题在相关文献中已经较多且形成共识(蒋中一,2005;苏群、丁毅,2007;牛建林,2012),本文不做深入探讨。在社会大环境的变迁过程中,虽然个人的经济观念强度直接或间接受宏观的社会结构、文化环境、价值导向等力量的约束,但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本身的问题属性在已有研究文献中缺少重视。辍学打工青少年在个人行动理念中具有较强的“经济”诉求,而且这种诉求对打工的直接效益期望超越了完成基本义务教育的期望,由此形成主动选择而非被迫性的辍学。这表明35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在思维方式上与传统狭义小农追求“风险”最低而非“利益”最大的逻辑基本相同,没有跳出“小农”思维即经济决策依赖“直觉经验、下意识与非逻辑思维”(恰亚诺夫,1996)。所以,我们建设新农村的导向应该考虑农民工勤劳与贫困相伴的文化悖论(吉尔兹,1987),也应该考虑农民工外出能不能改变城乡不平等的问题(Knight, John Reform, 2008; Partridge. etc, 2008),改造传统农业的首要使命可能既不是农业投资,也不是鼓励农民打工,而是改变农民的思想与认知。借用阿玛蒂亚·森的说法,辍学打工的“挣钱”行为是靠自己的感觉与先前经验做出的“感性选择”(阿玛蒂亚·森,2006),属于理性化的傻子。

第一,青少年本人及其父母对利益维度把握的单一性(纯经济理性)。辍学打工的青少年在“计算”自己人生道路的投入与产出效益时,只核算直接可以看得到、接触到的经济“投入与产出”,只看到那些赚到钱的打工者,而对那些“带着失落的情绪和空空的钱袋返乡者”(瑞雪·墨菲,2009)却缺乏反思的能力。笔者在农村调查的过程中,确实感觉到相当一部分农村父母与孩子的“偏执”一致:对于孩子未来的个人发展空间、社会地位等问题不重视或者是认为不可能;对于某一个人家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而自己的孩子则只能打工的问题,大多数打工的农民则并不着急,也不觉得“没有面子”。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没上大学的人多了”,不上大学也不丢人,甚至觉得自己都不识字,孩子能够认识字已经不错了;二是打工挣钱盖房子是自己可以“把握”的,只要想改变立马就可以动手做,三五年就完全可以实现;而且过程可控——想多挣点的时候就多加点儿班儿,无非是多干些挣钱的重活儿,多吃点儿苦。但上大学不但要花费大笔的学费,将来工作的问题也没有把握,即使上班了也不一定有多高的工资,有的家长甚至是计算大学生平均工资多少年才能挣回“上学的成本”,并且加入了上大学期间不能打工的“机会成本”。这种单一的经济理性思维在越是年轻的农民工身上越显得浓厚,其形象正如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单面人所具有的“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方式”(马尔库塞,1989)。

第二,对事情发展把握的短期性,看不到也顾不了长远发展。辍学打工的青少年及其家长在选择辍学打工的决策过程中,往往把诸如住房、家庭日常开支运转等显在的、眼前的事项列为“当紧的”内容,认为这些问题“非解决不可”:没有新房子的农民往往非常着急,他们一般认为别人有房子就有面子,而自己没有新楼房就是没有面子,哪怕孩子能够上大学,盖房子也是“当紧”的。房子不但是面子的体现,而且是能力的象征——别人都可以挣到钱,盖新房子,你为什么不能?那不是你没有本事嘛!对于“下一代”的未来将会怎么样,他们往往认为那是多少年以后的事“谁说得了”。

第三,对风险认知的偏面性。多数农民工对家庭劳动力投入的计算只算一个人从事某一“行当”时的经济投入和劳动力的个数,而对家庭整体的投入成本及机会成本往往考虑不周全。比如,农民核算农业与打工之间的风险与收益的比较时,他们只核算同样一个劳动力如果在家,一年需要的化肥、农药、种子钱等,而外出打工除了车费外,不需要“投入”了;相比之下,农业的收入则是非常低的,一年按照二季种植的话,一个劳动力从事农业的纯收入大概平均在2000~3000元的样子,而打工的话一个月的纯收入就有这么多。况且打工的钱还是现金,大多情况下当月或本季度可以兑现,而农业收入则要等一年。但农民对这两种劳动的强度、劳动力具体付出劳动时间的多少、体力支出的量他们是不计较的;孩子的教育、老人的照顾这种由于打工而“衍生”出来的风险成本也是被忽视的;而是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要外出打工,那么家庭就照顾不了,“这没有什么好说的”。这表明农民工对打工行为的核算只计较收入多少,但却忽视家庭综合成本、收益,特别青年农民工在计算劳动投入的成本时,倾向于忽略长远、全面的发展而更重视短期的、直接的效益。

第四,从过度理性化到物化、异化。物化是指农民的劳动观念越来越“工具理性”——所有的事情都是以“钱”为标准。这种物化直接导致农民工原有的一些乐于助人等品质不再继续保持,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博弈中已经习惯了讨价还价:用钱作为衡量一切行动选择的标准,谁给钱就给钱干活,甚至被招募充当打手也视为理所当然。过度工具理性、功利主义观念在农村邻里之间的帮工过程中也已经流行:农民本来是很乐于助人的,前些年见义勇为、救助他人于危急时刻的“英雄”多是农民和农民工,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农民互助”也是经常性的,但在“功利”观念过度强化之后,似乎越来越“急功近利”,现在农村请邻居帮工不付钱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生产劳动与经济交易上的物化取向逐步导致价值观念上的异化,价值观念的异化进一步导致道德上的滑坡,形成连锁反应。

5 政策讨论

农民工在做打工决策时,往往只算“经济帐”,长远规划、子女教育质量、家庭命运、国家层面的人力资本与社会发展等非经济问题或者说社会成本对于农民工个人来说往往是无法核算清楚的。但国家和人口流动政策的管理部门不应该把其看作只是“农民工”个人选择的事情。在2010年5月19日举行的中国人口与发展咨询会上发布的《中国劳动力变动趋势及判断》指出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5%,远低于发达国家75%的平均水平,而在当前14~35岁的青年人口中,就大约有2000万~3000万的“义务教育阶段”辍学者,部分地回答了中国人力资本贡献率较低的问题。

第一,在打工政策的导向上,必须矫正过度功利、单一的经济导向,正视打工的短暂性、过渡性、边缘性、被动性(被雇佣)等根本特征。自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确定以来,我们国家和主流的经济学将“经济增长”当成一种不可否定的社会指导理念(加尔布雷思,1980),虽然现在提倡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但经济霸权思维仍是主流。无论是从维护全面的社会稳定,还是促进城乡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都应该结束打工的“超长期”运行,要么向正式的人口迁移转变,要么促进农民工合理、适度地回流。最基本的底线是保证未到成年年龄者不辍学外出务工。而要实现这一底线,农业收入水平怎么样提高才能让农民不再“辍学打工”应当成为一个政策顶层设计,因为农民辍学打工的根源在于过度的经济导向及城乡差距结构。

第二,改革现有的人口流动政策,实施梯度人口流动,并通过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制度,引导农民更多地把子女教育放在家庭决策的首位。比如通过家庭奖励制度、流动年龄梯度规定来引导农村人口合理、有节地流动,而不是所有自认为“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可以外出打工,杜绝辍学打工,促进劳动力供求结构的合理化发展。甚至有必要通过强化法律手段的执行来落实梯度人口流动政策的硬性限制。

这里应当指出,阶段或阶梯性地限制农民外出打工,并不等于保持农民“贫困化”。近年发展中国家贫困率(每天1美元标准)的下降(从1993年的28%降至2002年的22%),主要就归功于农村贫困下降(农村贫困率从37%降至29%,而城市贫困率基本维持不变,为13%)。而农村贫困人口的减少中,80%以上归功于农村地区的条件改善,而不是贫困人口的迁出。因此,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并不是农村(及全球)减少贫困的主要手段——这与人们的一般感觉刚好相反(《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概要第3页)。

第三,对于已经形成的辍学打工结果应建立“应急性农民工救助机制”。由于早期人口流动政策不够完善,留守儿童辍学等形成了很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农村青少年犯罪、流动的青年民工犯罪上升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曾经历双亲外出留守的“农二代”犯罪概率尤为突出(陈刚等,2009;刘成斌,2013)。部分青年农民工在面临既找不到工作又救助无门的生存“危机”时,必然走向“偷盗”甚至“抢劫”;或者在面临生存困境时因为“一点儿小钱”而杀害利益矛盾的对方当事人事件也时有发生。所以,从应急的当下情境考虑,我们还应该针对农民工建立一个“危机应急救助”体系,主要应以民政、团委、妇联等部门进行协调,或增加农民工“社会工作”人员救助机制。专职社工人员主要提供“危机支持”:即“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找哪些人解决”,求助者遇到“没钱吃饭”的生存底线时,如何寻求合法的救助渠道,以避免农民工滑入“犯罪”歧途。

综上所述,农民工的打工行为既牵涉到家庭的决策与发展,也直接影响社会的秩序与趋势,我们应该用社会的眼光看待农民工辍学打工问题,并用建设性政策与措施改善农村青少年的个人选择与社会环境。

最后,需要提出本研究存在的不足。本研究在调查问卷设计过程中是先有问题意识再进行变量操作,关于调查对象的农村社会距离、城市社会距离、宏观社会趋势的认知等农民工个人观念的测量项目没有进行时间限定,严格地讲,这些变量应该反映被调查者首次外出打工前的状态。但在缺乏追踪研究的前提条件下,本研究如果采用回忆法让农民工回忆若干年前的态度面临以下两点难题:一是调查对象很难清晰地记住当时的情况;二是即使仍然记得,但回答问题时已经是经过后来认识的反省、对比、过滤后的答案。因此,本研究在变量设计方面的考虑是: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和经济观念、城乡距离感是基本稳定的。基于此,学术研究中探讨因果关系时,应该进行纵向的追踪研究而非横剖研究。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阿马蒂亚·森. 李风华译. 理性与自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4
Amartya Sen. 2006. Rationality and Freedom.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34.
- 2 陈刚,李树,陈屹立. 人口流动对犯罪率的影响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2009;4:52-61
Chen Gang, Li Shu and Chen Yili. 2009. Research of the Influence of Population Mobility on Criminal Rate.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s 4: 52-61.
- 3 黄平. 对农业的促进或冲击:中国农民外出务工的村级研究. 社会学研究,1998;3:71-82
Huang Ping. 1998. Promotion or Strike to Agriculture: Study on Migrant Work of Peasant Workers at Village Level. Sociological Studies 3: 71-82.
- 4 加尔布雷思. 经济学和公共目标. 商务印书馆,1980:7
Galbraith. 1980. 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Purpose. The Commercial Press: 7.

- 5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重庆出版社,1990: 12
Marcuse. 1990.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Chongqing Publish Press: 12.
- 6 刘成斌. 农民工流动方式与子女社会分化. 中国人口科学,2013; 4: 108 - 116
Liu Chengbin. 2013. *Social Mobility of Chinese Peasant-Workers' Children: Social Differentiat Patterns between the Floating-along and the Left-behind*.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s 4: 108 - 116.
- 7 牛建林. 农村地区外出务工潮对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的影响. 中国人口科学,2012; 4: 103 - 110
Niu Jianlin. 2012. *The Influence of Egress Laboring Boom in Rural Area on the Phenomenon of School Dropout dur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Period*.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s 4: 103 - 110.
- 8 蒋中一, 戴洪生. 降低农村初中辍学率和义务教育体制的改革. 中国人口科学,2005; 4: 59 - 66
Jiang Zhongyi and Dai Hongsheng. 2005. *Reducing the Rate of Dropout in Rural Junior School and Reform Compulsory Education System*.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s 4: 59 - 66.
- 9 卢德生, 赖长春. 从学生自愿性辍学看我国“控辍”政策的调整与转变. 教育学术月刊, 2009; 1: 79 - 81
Lu Desheng and Lai Changchun. 2009. *Adjustments and Changes of “Control Dropout” Polity in China in the Contexty Students' Voluntary Dropout*. Education Academic Journals Monthly 1: 79 - 81.
- 10 恰亚诺夫. 萧正洪译. 农民经济组织.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4
Chayanov. 1996. *Peasant Economic Organization*.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4.
- 11 瑞雪·墨菲. 黄涛, 王静译. 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 187
Rachel Murphy. Huang Tao and Wang Jing Translate. 2009. *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87.
- 12 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 商务印书馆,1987: 22
Schults. 1987. *To Transform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The Commercial Press: 22.
- 13 苏群, 丁毅. 初中阶段农户子女辍学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闽北农村地区为例. 中国农村经济,2007; 6: 39 - 45
Su Qun and Ding Yi. 2007.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chool Dropout for Children in High School: The Case of North Rural Fujian*. China Rural Economy 6: 39 - 45.
- 14 谭深.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述评. 中国社会科学, 2011; 1: 138 - 150
Tan Shen. 2011.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 of China*. China Social Science 1: 138 - 150.
- 15 王身佩, 徐宏升, 王连照. 从官方数据看辍学——河南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辍学问题研究. 教育研究与实验,2006; 3: 54 - 61
Wang Shenpei, Xu Hongsheng and Wang Lianzhao. 2006. *Examining School Dropout Phenomenon from Official Data: Research on the School Dropout Problem during the Compulsory Period in Rural Area of Henan Province*. Education Research and Experiment 3: 54 - 61.
- 16 王志中, 胡萍. 农村留守儿童辍学问题探析.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0; 10: 54 - 57
Wang Zhizhong and Hu Ping. 2010. *Exploration on the Problem of School Dropout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 Shanxi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0: 54 - 57.
- 17 张士菊. 农村青少年辍学的非经济因素. 青年研究,2003; 1: 36 - 38
Zhang Shiju. 2003. *Non-economic Factor of School Dropout of Teenagers in Rural Area*. Youth Research 1: 36 - 38.
- 18 Harri, J. R. 1995. Wheres the Child's Environment? A Group of Socialization Theory of Development. Psychology Review 3: 458 - 489.
- 19 Knight, John Reform. 2008. Growth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1: 140 - 158.
- 20 Partridge, Mark D. Rickman, Dan S. 2008. Distance from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Rural Poverty.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 285 - 310.